

世界经济中心转换的规律性 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俄〕谢尔盖·格拉济耶夫

【内容提要】 根据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随着世界经济型式的更迭，世界经济之“极”的形成和消亡呈周期性变化。当前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经济型式是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该型式有三种具体类型：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寡头政治。世界新秩序将在这三者的竞争中形成——主要是前两者的竞争，因为美国统治精英发动的全球混合战争将注定失败。新的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将产生一个两极核心：中国和印度。至少从17世纪起，俄罗斯就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独立一极，但要摆脱目前在新旧世界经济型式核心之间的边缘地位，俄罗斯必须彻底调整经济政策，在新技术型式的基础上落实加速发展战略；随着全球混合战争的结束，美国用来维护其霸权的国际组织（北约等）的影响力将迅速消退。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恢复了国家主权和以其为基础的国际法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文明相似度、精神价值观和共同历史命运等非经济一体化因素的重要性也会显著上升。也就是说，一体性经济型式的多极性将具有文明内涵。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型式 世界格局 多极文明 国际经济新秩序

【作者简介】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С. Глазье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总统欧亚一体化顾问。

【译者简介】 白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

根据笔者提出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①，我们把世界经济中心视为

^① Глазьев С. У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м экономики: курс лекций.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9.

其统治精英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通过梳理世界经济型式^①的更迭路径，可以总结出世界经济中心的周期性变化规律。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经济型式发生更迭时，存在的中心应当不少于两个（新旧世界经济型式至少各有一个）。在这一过渡时期结束后，全球主导地位将归属于新经济型式的核心国家。

一 世界经济之“极”：随世界经济型式的更迭而改变

乔万尼·阿里吉^②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划分为四个世纪性的体系资本积累周期：西班牙—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目前正在被亚洲取代）。在长达五百年的资本主义时期内，西班牙—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的统治精英前后更替，成为世界经济决定的决定性动力。而现在，他们正被中国共产党人取代。在第一个周期中，热那亚资本为西班牙帝国的迅速扩张提供了财政基础，而后来的周期都由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其生产关系和体制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生产效率逐渐下降，一个生产关系和制度更为高效的新领导者在外围崛起，最终，全球的主导权在一场世界大战之后转移到其手中——这些战争往往是由正在退场的主导国为维持世界霸权而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发起的，但它们没有注意到，拥有自身地缘经济之“极”的新世界经济型式已经形成。

阿里吉所揭示的世纪性体系资本积累周期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这些阶段，不仅主导国不同，再生产管理体系和经济发展也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对其进行研究，笔者引入世界经济型式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由相互关联的国际和国家制度构成的、能确保经济扩大再生产并决定全球经济关系机制的体系^③。主导国的体制对调节世界市场和国际经贸、金融关系的国际机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它们也是外围国家的榜样——外围国家试图通过移植主导国强加的制度来进行追赶。因此，世界经济型式的制度体系渗透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再生产进程中，是国家、地区和国际要素的统一体。

^① “世界经济型式”（мир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уклады）是作者根据世纪性资本积累周期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而引入的一个宏观概念，作者在下面的正文中有所说明。为与通常所见的“模式”或“形态”区别，本文将уклад译为“型式”。

^②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③ Глазьев С. Мир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уклады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2016. Т. 52. № 2; Глазьев С. Приклад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теории мир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укладов//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2016. Т. 52. № 3.

体系资本积累周期是世界经济型式生命周期的一种表达形式。阿里吉所描述的西班牙—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和即将接替它的亚洲的世纪性资本积累周期，分别代表了世界经济从贸易、贸易—工场手工业、殖民、帝国到一体性等型式的相应生命周期。它们在再生产管理体系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如此悬殊，以至于迄今为止，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的过渡都是通过世界大战和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在这些进程中，旧管理体系被摧毁，战胜国又搭建了新管理体系。

世界经济型式不仅在国际贸易的组织类型上迥然不同，在生产关系和制度体系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促使领先国取得全球优势，也使得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制度得以形成。世界经济型式的类别是由主导国际经济关系并构成世界经济体系核心的先进国家的制度体系决定的。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体系外围可能复制出其他低效甚至陈腐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组织制度体系。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与外围之间关系的特点是，非等价对外经济交换有利于核心，即核心国家利用其技术、经济和组织优势，以生产知识、垄断租金、经营收入和股本溢价等形式获取超额利润。因此，核心国家构成了世界的中心，主导着国际经济关系，也决定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竞争逻辑决定了某个国家在某种世界经济型式生命周期中的主导地位。这与国家立法和主权在确保扩大资本再生产方面的作用有关。国家主权通过国家信贷和银行体系、国家货币的发行、国内市场的各种保护措施以及对产权的司法保护，为统治精英提供了无限积累资本的可能性。尽管国际条约可以规定产权和外国投资者保护规范，但在实践中，能否遵守这些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对比关系。国家武装力量往往成为解决地缘政治矛盾的决定性变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各国获得国家主权铺平了道路，直至今日，国际层面上还没有任何超国家或国家间机构，在经济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效率接近于那些最强国。即使在文明上较为接近的国家结成各种联盟，其力量也远不如将主权国家内部各经济实体的经济关系整合成一个有机体的制度。一个国家越强大，其权力精英就越有机会在国际关系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包括通过对外进行非等价交换、开发自然资源和剥削相对弱小国家的人力资本（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无法确保国家主权）来敛财。

民族国家实力与通过非等价对外经济交换方式积累资本能力的直接相关性，引发了一股提升国家实力的热潮，这些国家主导了新世界经济型式的形成，其统治精英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利用国家的优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过程，该体系的中心先后从意大利北部转移到西班牙、荷兰，后来移至英国和美国。与此同时，失去领导地位的国家沦落到外围，而另一方面，新的领导者又从外围崛起。

世界经济型式生命周期由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构成。在第一阶段，得益于超高效的管理体制，新世界经济型式核心国家在新技术型式的长波增长中获得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与此同时，旧经济型式核心国家却因资本过度集中于旧技术型式下的陈旧产业而陷入结构性危机和经济萧条。它们不择手段，试图保住霸权，包括挑起竞争者之间的世界大战。殊不知，它们之间的相互削弱却为新经济型式下正在形成的核心国家实现经济突破创造了更多机会。最终，这个新的核心国家获得了全球领先优势，而后又不断将自己提升至主导地位。英西战争后的荷兰、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均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全球主导地位。当前美国发动的全球混合战争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突破，而中国正在成为新世界经济型式核心。

在夺取了全球主导权之后，在世界经济型式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核心国家可以将自己的国际金融经济交换条件强加于其他国家，包括使用其货币、金融机构、对外贸易和运输的基础设施等。在金融扩张阶段，核心国在业已成熟的世界经济型式中的主导地位转变为全球霸权，其显著特点是通过非等价贸易交换、操纵国际价格、资本挤压和吸引国外人才等手段掠夺外围国家的资源，并从中攫取超级利润。这种霸权的另一面是政府公共债务不断增加，经济生产力不断下降，金融投资比例超过生产性投资。世界经济型式步入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而这一阶段恰好是在世界体系外围诞生新经济型式的阶段——其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管理体系的效率要高得多。

依据上述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世界经济型式的成熟阶段属于单极体系，在经济型式更替期则往往是多极的。在新的世界经济型式形成阶段，会出现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国家，它们既与即将退出的霸权国家进行博弈，又彼此相互竞争，其结果是出现主导地位不断上升的全球领导者。在整个世界经济型式的各阶段，独立于这些国家存在的俄罗斯虽然政治形态不同，但都保持着全球影响力，阿里吉却完全忽视了它的历史作用。

二 俄罗斯：拥有国际影响力的独立一极

事实上，根据阿里吉的划分，在以热那亚－西班牙体系资本积累周期为开端

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俄罗斯都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独立一极。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经济型式是两极的——美国和苏联各自掌控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它们的竞争场域。在此之前的殖民经济型式下，俄罗斯帝国在与大英帝国的博弈中成功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阿拉斯加和北太平洋。在贸易—工场手工业的世界经济型式中，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的现代化改革，在技术发展方面迎头赶上，并在生产规模上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领袖荷兰。伊凡雷帝时期的莫斯科公国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和金帐汗国的部分领土，在实力上几乎不逊于西班牙帝国，并且与其没有产生任何矛盾。

因此，至少从 17 世纪起，俄罗斯就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独立一极，它与世界经济型式下相互竞争和相继出现的西方核心国家平行存在。这里我们不考虑之前那一段充斥历史伪造的时期——它掩盖了俄罗斯在金帐汗国桎梏下和拜占庭时期的世界影响力。本文只涉及有据可考的 17 世纪至今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可以明确追踪世界经济和技术型式的演变。在此分析基础上揭示的规律性使我们能够对本世纪末之前世界经济发展之“极”的转移作出可靠的预测。但俄罗斯所能发挥的作用依旧难以预测——它一直是世界发展的独立一极，与世界经济型式更替下相继出现的西方核心国家并行存在。

在大动乱时期以及罗曼诺夫王朝开启之后，俄罗斯与欧洲各国陷入了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欧洲各国在不同时期，有时是盟友，有时又是对手，但它们都将俄罗斯视作一股阻碍社会生产关系自由化和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进程的反动势力。欧洲统治精英惧怕俄罗斯，并且周期性地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试图将其击垮和肢解。世界经济型式进入殖民时期以及英国建立世界霸权以来，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与西方对立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极。

而在俄罗斯方面，其领导人有时将西方世界体系中不断变化的核心国家视为盟友和伙伴，有时将其当作对手和敌人，有时师其长技，有时又自以为师。长达几个世纪的体系资本积累周期所触及的俄国多半处于外围而非中心，直到苏联完全停止了参与这一进程。而现在，西方正试图夺走俄罗斯所积累的一切。因此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统治精英还是未能明确对西方的态度。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前者将俄罗斯的特殊地位归因于它的落后，并主张通过与西方融合来摆脱这种状态，后者则认为俄罗斯的特殊使命是将人类从植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而如今，由于集体西方的反俄行为，这一争论已失去意义。事实上，西方国家长达半个世纪的全球统治

已经在走向终结，资本主义时代也将随之落幕。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那里正在形成新的全球影响力核心。

三 世界经济新形式之“极”

当前世界经济型式的演变完全符合我们此前发现的关于这一进程的规律^①。这一进程以苏联解体为开端，如今要以“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瓦解作结。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统治精英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试图击溃或搅乱那些已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一行为也完全符合之前的理论。然而，由于中国创建的管理体系更加优质和高效，美国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已经输掉了与中国的经贸战，到当前的五年计划结束之际，中国将实现技术主权，并在科技潜力方面遥遥领先。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也在迅速丧失其在货币和金融领域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投资，远远超过了美国对其大肆宣传的“印太未来”倡议的拨款。根据各种测算，“一带一路”倡议预计耗资4~8万亿美元，“印太未来”项目的规模与之相比显然相形见绌。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投资组合也让当年资助西欧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黯然失色，后者的规模按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可达1800亿美元（70年前为120亿美元）^②。

苏联解体后，美国统治精英急于宣布其最终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③。然而，这种兴奋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消散，这也标志着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资本积累周期走到了尽头。美国称霸全球的时代比英国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霸权地位因1929年的金融危机而终结。接踵而至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葬送了大英帝国——它已无法与苏联和美国效率高得多的治理体系相抗衡，而苏联和美国构成了取代殖民体系的帝国经济型式的两极。

如今，中国在所有宏观经济指标上都已超过美国。中国几乎未受过去十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于2010年8月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以3.87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3.82万亿美元），取代了美

^① Глазьев С. Последня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США начинают и проигрывают. М. : 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6.

^② Steinbock D. “U. S. - China Trade War and Its Global Impacts”,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18. Vol. 4. No. 4. pp. 515 - 542.

^③ Фукуяма Ф. Конец истории и последний человек. М. : АСТ, 2010.

国长达 60 年的全球跨境贸易领头羊地位。到 2014 年年底，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 17.6 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17.4 万亿美元）这个自 1872 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①。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工程技术中心。2007 年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占全球相关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 20%，比 2000 年翻了一番（分别为 142 万和 69 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人由美国硅谷回到中国，并在中国创新企业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到 2030 年，全球将有 1 500 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其中 450 万（30%）将是中国人^②。到 2030 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支出将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支出的 25%^③。

2000 ~ 2016 年，中国在全球物理科学、工程学和数学出版物中发表的作品所占的份额翻了两番，成功超越美国。2019 年，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也高于美国（分别为 58 990 份和 57 840 份）。除了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超过了美国的头部企业。例如，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连续第三年以 4 144 项专利遥遥领先于美国高通公司（2 127 项）。

中国也是全球移动支付的领导者——美国位居第六。2019 年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总额达 80.5 万亿美元，预计移动支付规模为 111 万亿美元，而美国为 1 300 亿美元。这似乎表明，美国发行的大部分货币都被束缚在金融市场的交易环节，没有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

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正在迅速下降，而人民币的份额正在稳步上升。与此同时，在收入持续收缩的基础上，美国主权债务金字塔和数万亿金融衍生品泡沫还在持续增长（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翻了一番），毫无疑问，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行将崩溃。

2008 年以来，美国的货币总量增加了四倍多，但这并没有带动经济增长，因为大部分货币都被用于吹大金融泡沫。而中国在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投资的同时，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经济货币化，并形成了更有效的资本积累再生产循环。

中国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其在新经济型式之下的体制结构，它确保了对经济发

① Dilip Hiro, “Why China is Taking Over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Asia Times*. August 19, 2020.

②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鄢一龙、魏星执笔）：《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 页。

③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риоритеты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БРИКС/под ред. В. Садовниченко, Ю. Яковца, А. Акаева. М.: МГУ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Питирима Сорокина – Николая Кондратьева – ИНЭС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 – Институт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РАН, 2014.

展更有效的管理。通过将统筹规划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结合在一起，新世界经济型式与它的前身——指令性计划和全面国有化的苏联体制以及由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美国体制——相比，社会经济发展管理的效率有了质的飞跃。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创纪录的增长速度上，从中国已经走在了科技进步的前列也可见一斑。其他采用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制度的国家，其飞跃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在美国通过日元大幅升值人为阻止其崛起之前；韩国——在1998年美国金融寡头挑起亚洲经济危机之前；当代越南很大程度上效仿了中国经验；印度施行新世界经济型式下的民主制度；埃塞俄比亚——在中国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下实现了创纪录的增长率。

无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如何——是中国或越南的公有制，还是日本或韩国的私有制——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特点都是将国家计划与市场自我组织、国家对经济再生产主要参数的控制与自主经营、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与个人主动性相结合。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形式可能会有本质差异——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到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变的是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体现在严格的公民个人责任中：国家要求公民行为自觉，严格履行义务，遵守法律，为国家目标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管理体制的基础是旨在提高社会福祉的个人责任机制。

因此，鉴于美国统治精英发动的全球混合战争的最可能结果对其不利，新的世界经济型式将在中印之间的竞争中形成，其结果将取决于它们在掌握新技术型式下的机遇和化解其带来的威胁方面的相对有效性。在新的世界经济型式中，竞争很可能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展开，这两个国家目前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与其伙伴国一起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这种竞争将是和平的，并受国际法制约——无论是全球安全管控还是世界货币发行，这种制约的所有方面都将以国际条约为基础。拒绝承担责任并接受国际监督的国家将在相关国际合作领域中被孤立。世界经济将变得更加复杂，国家主权重要性的恢复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多样化，将与拥有超国家权力的国际组织的根本作用结合在一起。

在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中，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会是对抗性的。例如，中国提出的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有许多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选择加入。奉行民主制度的欧盟国家也正在与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建立自由贸易区。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对效率将最终决定竞争格局。

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将伴随着中国的强大和美国的衰弱。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包括欧盟和俄罗斯，将受到这一转变的重大

影响。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变化的规模。在乐观情况下，西方经济已持续十余年的“大停滞”将再延宕数年，直到金融泡沫破灭后剩余的资本被投入到新技术型式的生产中，它们才能赶上新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如果事态发展不利，金融体系的货币注入将导致急剧通货膨胀，进而破坏经济再生产秩序，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发政治危机。美国统治精英将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接受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事实，不再像 19 世纪时那样试图组建世界政府，而是与各国就投资条件进行谈判。这将使它有机会作为主要玩家参与打造新世界经济型式。第二种选择是升级其已经发动的全球混合战争。虽然客观上他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但他们可以对人类造成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伤害。

另一方面，随着被美国统治精英剥削的国家逐渐摆脱控制，美国资本积累周期的再生产系统也将被加速破坏。如果我们对上次世界经济型式更替时期重新进行历史类比，那么最后阶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类比）可能长达七年。迄今为止，这些类比得到了令人惊讶的证实。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与当前世界经济型式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吻合，始于 1985 年苏联的经济改革，止于 1991 年苏联解体。上一个周期则始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止于 1918 年阻碍英国资本全球扩张的四个欧洲君主国的崩溃。

接踵而来的是过渡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主导国的实力达到顶峰。一战结束后，英国建立起了长达二十年的霸权，一直持续到为二战奠定基础的《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在这一过渡阶段，原有的世界经济型式达到了发展极限，而在其外围出现了构成新世界经济型式核心国家。在上个周期中，它以三种政治形式呈现：苏联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如今潜在的核心国也分为三种政治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印度民主民族主义以及全球主义者的世界独裁（мировая диктатура）。与上次一样，这一阶段从 1991 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暂时的“美式和平”开始，历时二十年。

最后，过渡时期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与主导世界经济型式核心国家被摧毁以及新世界经济型式的形成有关，新型式下的核心国家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在这一阶段，旧世界经济型式的主导国会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以维护其霸权地位，最终，奉行新经济型式的国家会取得胜利，并获得全球领导权。在上个周期中，这一阶段始于 1938 年签署的《慕尼黑协定》，止于 1948 年大英帝国的崩溃。如果我们将纳粹分子在基辅发动政变、事实上占领乌克兰以及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视为美国发动全球混合战争的开端，那么当前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则始

于2014年，预计将于2024年结束。正如预言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潘京（В. И. Пантин）所预测的那样，2024年美国对俄罗斯的攻击强度将达到顶点。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俄罗斯将举行总统选举，其政治发展周期也将迎来变化。

仔细梳理上一次世界经济型式变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始于当时的主要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以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为特点的新世界经济型式的雏形。十五年后，为了克服经济大萧条，美国实施了新政，形成了另一种具有福利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经济型式。与此同时，在日本、意大利以及后来的德国也形成了第三种新世界经济型式——纳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型式。

上述变化均发生在英国殖民经济型式基础上、资本积累周期的最后阶段。当时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统治精英试图抵制破坏其全球统治地位的变革——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为了引发大规模饥荒而只允许从苏联进口粮食；对美国实施贸易禁运；鼓励德国反共产主义的纳粹政变。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英国特勤部门还保护并推动希特勒上台。出于同样的意图和对巨额红利的期待，美国企业对德国工业的现代化进行了大量投资^①。

英国人推行传统的“分而治之”的地缘政策，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他们希望再现当年发动一战的成功，而一战的前奏就是伦敦挑动日本进攻俄国。一战导致英国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中华帝国——互相残杀并走向灭亡。但是，二战爆发后，“第三帝国”在经济管理效率和调动军事资源方面的优势立即超过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而日本在东南亚广袤领土上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组织和技术能力显著超过了英美联盟。虽然英国凭借与美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成为二战的胜利国，但英国失去了其整个殖民帝国——90%以上的领土和人口。

当时最有效的是苏联的国民经济综合管理体系，它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三个经济奇迹：将工业企业从其领土的欧洲部分疏散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在半年内重建新工业区；在战时条件下实现了超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总值，这些指标大幅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和；战后迅速恢复了被占领者完全摧毁的城市和生产设施。

^① Charles Higham.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n Expose of The Nazi - American Money Plot 1933 - 1949*. New York, 1983.

罗斯福新政大大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动员能力，使美国得以在太平洋沿岸击败日本。在战后的西欧，美国没有了对手：在利用北约集团与苏联隔绝之后，美国统治精英实际上将西欧国家完全私有化，包括其剩余的黄金储备。在第三世界，欧洲国家的前殖民地沦为美国企业和苏联部委之间的竞争场域。后来，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在美苏两个世界帝国之间的冷战阴云下进行的，这两个帝国在管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相似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截然相反的政治型式。它们各有利弊，但在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资源调动的效率方面，都要远远优于残酷剥削雇佣劳动者和奴隶的家庭资本主义殖民体系。

当前也出现了类似的图景，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经济型式也有三种具体类型。第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率先形成，其特点是国家规划与市场自我调节相结合，国家管控经济再生产的主要指标与自主经营相结合，共同福祉的理念与个人创新相结合。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先进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已经有目共睹，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绩效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第二种类型正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形成。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早就立足于印度文化的根基，为这一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印度独立后颁布的宪法，明确了其经济体制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准则在战略规划、社会政策规范和金融监管体系中均得到了落实。货币发行准则由一个特别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根据社会经济政策明确的优先事项，确定发展机构和银行在向小企业、农业、工业等部门贷款时的再融资比例。英迪拉·甘地政府通过将银行系统国有化，顺利实现了依据经济发展的指导计划管理资金流。正确合理的优先事项安排推动了形成新技术型式关键领域的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不久，印度的经济增速跃居世界首位。

世界经济新型式的第三种形式在以美国为中心、寻求统治世界的金融寡头眼中，只是一个未来的模糊轮廓。在美国深层国家的内部出现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声音。这种世界经济新型式实际上是在美国统治精英的领导下组建一个世界政府来控制全球货币发行、跨国银行和企业以及全球金融市场来实现金融寡头的利益。这是自由全球化趋势的延续，辅之以对被剥夺主权的国家的人口控制。

上述几种新世界经济型式都涉及一项关键因素——对先进信息技术的使用。这些技术都依赖于大数据处理方法和人工智能系统，这不仅是控制无人化生产过程所必需的，在规范经济和社会行为体系中的个体方面也不可或缺。此类调控的目标由统治精英确定，而精英群体的形成方式也决定了上述每种新世界经济型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组织规范经济活动以增加人民福祉，并引导社会

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前进。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最高效的生产和技术体系在竞争中获胜，它们能带来的利润与其对增加社会福利的贡献成正比。同时，包括非国有企业在内的大中型企业都设立了党组织来确保管理人员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这种道德规范一方面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鼓励管理人员和企业所有者保持谦逊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惩戒滥用市场主导地位和投机操纵市场的行为，反对挥霍无度、坐享其成。为规范个人的社会行为，中国正在建立一种社会信用制度。这种制度的底层逻辑是每个公民能获得的社会机会取决于其信用评级——该评级将根据行为人的好坏表现不断调整。评级越高，一个人在申请工作、晋升、获得贷款或授权时就越有优势。这种系统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对它们的评估也超出了本文研究范畴。

第二类新世界经济型式是由民主政治制度决定的，而不同的国家之间，制度差异可能会非常显著。民主政治在瑞士最为发达，那里的主要政治决策都是通过全民公决作出的。对世界经济而言，这种型式最重要的体现者是印度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社会民主国家。这种政治制度下的大多数国家受到腐败的严重困扰，容易被大型企业操纵——这些企业并非全部具有爱国属性。将现在广为人知的分布式账本信息技术（区块链）引入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可以消除操纵选票现象，确保候选人平等接触媒体，从而大大提高政治制度效率。当前自媒体的日益盛行造成了信息来源的竞争，同时也为候选人接触选民提供了便利。如果在选举过程中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给予适当的法律支持，就会形成政府部门对其涉及公众利益的活动结果主动负责的自动化机制。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社会事务越积极，民主政治制度就越有效。其主要问题在于统治精英的形成依赖于对选举的透明度和诚实度不感兴趣的家族-企业集团。

最后，第三种新世界经济型式是由金融寡头的利益决定的，他们追求世界霸权。这种霸权通过自由全球化来实现，即削弱国家经济监管机构，使再生产服从国际资本的利益。在国际资本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几十个盘根错节的美欧家族，他们手握最大金融控股权，控制着强力机关、特勤部门、媒体、政党和政府部门^①。美国统治精英正在对其控制之外的所有国家发动混合战争，利用金融、信息、认知甚至生物技术等各种工具来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制造混乱。他们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打造一个由其控制的全球制度体系，通过现代信息、金融和生物工程技术来监控世

^① Коулман Д. Комитет 300. Тайны миров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 : Витязь, 2005.

界经济再生产，甚至整个人类的再生产进程。这种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完全不负责任和道德的，其世袭权力精英坚持马尔萨斯主义、种族主义和部分厌世主义立场。

世界新秩序将在这三种新世界经济型式的竞争中形成。其中，最后一种型式与前两种型式均互相排斥，而前两种型式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形成新的世界经济型式有三种预测方案。它们的共同物质基础是新技术型式，其核心是一系列数字、信息、生物工程、认知、加成和纳米技术。在此类技术的基础上，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机制正在形成，这些机制有意识地管理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乃至全人类的发展。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在公私合作基础上，将国家战略规划与市场竞争相结合来实现。前述新经济型式的类型将会依据对自治经济实体活动的管理符合哪一群体的利益而形成。前两种类型——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可以和谐共存，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与合作。第三种——寡头政治——与前两种是对立的，因为它意味着由几十个美欧家族世袭统治世界，既不符合民主价值观，也不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

人类将遵循三种预测情景中的哪一种演进，取决于美国统治精英对主权国家发动的混合战争的结果。在前文描述的建立新世界经济型式的三种方案中，全球资本主义寡头统治的可能性最小。尽管今天的全球混合战争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展开的，但美国统治精英注定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在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的所有前景中，美国资本积累周期的再生产机制都会受到侵蚀，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会相应减弱。毫无疑问，美国统治精英将不择手段地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正如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最近所提到的那样^①，这些精英将努力引导事态朝着建立世界政府的方向发展。在由其控制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对新冠病毒、全球变暖和生态灾难的恐惧导致人们越来越接受这种方案。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美国金融寡头的目的是巩固其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维护它，这使得其他国家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为了使这些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盎格鲁-撒克逊的地缘政治传统拥有各种手段，如使他国相互对立、挑起社会和政治冲突、组织政变、鼓励分裂主义分子扰乱不受控制的国家和地区等。为了将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欧亚大陆乃至全人类的风险降到最低，有必要立即组建一个反战联盟，该联盟应能给侵略者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

反战联盟的潜在参与者可以包括所有对新的世界大战不感兴趣的国家和生

^① Спаситель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едлагает мировое 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РИА “Новости”. 28 марта 2020 г.

活在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这些国家首先是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俄罗斯和中国，也是在新技术型式的增长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奉行新世界经济型式的国家：中国、印度、一些东南亚国家，它们正在形成新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所有保留了自身主权的后苏联国家，它们是建立自身体制和机制的先行者。当然，还有与亚洲经济发展中心国合作的受益国，这些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欧亚一体化进程获得了积极的经济推动力。

当前世界经济型式的“核心”国家将普遍的金融和经济关系体系作为自由全球化的基础强加给世界，而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经济型式的“核心”国家则与之相反，具有显著的多样性。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这些国家一致认同的国际关系原则上：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历史和文化遗产主权。新世界经济型式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应急储备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亚开发银行）都是基于上述原则而建立的。

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大型国际组织的成功扩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型式：它推崇多样性而非普遍的自由全球化形式。其基本原则是坚决支持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和准则，反对强制施压和侵犯他国主权。新世界经济型式的新兴“核心”国家所共同支持的国际秩序原则与以往由西欧文明建立的世界经济型式下的原则有着本质区别，亨廷顿也认为，“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①。

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组对于世界经济向新的型式过渡至关重要。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新架构应在契约和法律基础上搭建。世界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必须遵守对国债数额以及国际收支和贸易赤字平衡的数额限定，从而保证储备货币的稳定性。此外，它们还必须遵守在国际法基础上制定的相关要求来确保其货币发行机制的透明度，以及在其领土上交易的所有资产的通兑性。

四 新世界经济型式下的世界格局

依前所述，到本世纪末，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可能呈现出如下图景：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新的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将拥有一个两极核心：共产主义的中国和民主的印度，全球一半的 GDP 增长将产生于它们之间的竞争。

——距核心国最近的外围：东盟、巴基斯坦、伊朗。

——摇摇欲坠的旧世界经济（帝国）型式的资本主义核心（美国和英国）及其卫星国仍将保持重要影响力。

——欧盟、土耳其、阿拉伯世界在新旧世界经济型式的核心国之间徘徊，它们的世界影响力将取决于其摆脱美国操纵的能力。

——与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核心国相邻的旧型式残余力量（日本、韩国、台湾）在摆脱对华盛顿的依赖后有可能融入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

——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潜在外围国：非洲、中亚、拉丁美洲。

——根据当前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既可能进入新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核心，也可能留在其潜在外围，亦即它们现在实际所处的位置。为了摆脱目前在新旧世界经济型式核心之间的边缘地位，俄罗斯必须彻底调整经济政策，并依靠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制度和管理方法，在新技术型式的基础上落实加速发展战略^①。

——能够巩固新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的国际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其影响力将不断扩大。

——美国用来维护其霸权的国际组织（北约等），其影响力将随着全球混合战争的结束而迅速消退。

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不同于帝国经济型式，它恢复了国家主权和以其为基础的国际法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多样性——民族国家及其一体化联盟可以在寻找自身在世界经济关系中最舒适位置的过程中，塑造不同的国际关系格局。与此同时，精神文化、文明相似度、精神价值观和共同历史命运等非经济一体化因素的重要性也会显著上升。相应地，历史—精神世界中心国的影响力也会提升，这一因素也将被纳入一体性世界经济型式形成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一体性经济型式的多极性将具有文明内涵，这也展现了多极文明世界的理念^②。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Глазьев, Рынок в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я в новых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 мир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м укладах. М.: 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8.

^② Дугин,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М.: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